

西北政法学院学术丛书

现代思维方式论

——整合创新的全球思维

张周志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周志，1960年生，西北政法学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兼陕西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1978年考入大学，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认识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法哲学等的研究和教学。在《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美）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和校内重点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人脑·信息·认识》、《选择与重建》、《市场学与市场心理学新论》、《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比较与反思：当代哲学思维》等多部著作。

目 录

导 论	和而不同 整合创新·····	(1)
第一章	哲学思维方式的沿革是一个整合创新过程·····	(7)
第二章	论道践仁与求知功利 ——思维目标之整合·····	(13)
第三章	整体统观与精确分析 ——运思途径之整合·····	(23)
第四章	直觉智慧与经验分析 ——思维方法之整合·····	(34)
第五章	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 ——主体致思趋向之整合·····	(45)
第六章	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文化 的整合·····	(58)
第七章	积极整合科学和民主思想·····	(74)
第八章	中西整合的困惑 ——科玄论战·····	(91)
第九章	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维 ——中西思维整合创新的硕果·····	(120)
第十章	当代西方哲学思维整合创新的总体特征·····	(157)

2 目 录

第十一章	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 ——逻辑分析与经验实证方法的整合·····	(167)
第十二章	存在主义把西方式的悲悯与东方式的忧患 意识相互整合·····	(175)
第十三章	结构主义的方法试图整合人类的全部 科学·····	(199)
第十四章	分析哲学的语言工具理性之整合·····	(220)
第十五章	科学哲学把科学理性与非理性方法相 整合·····	(255)
第十六章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整合创新·····	(285)
第十七章	义理学说与功利观念的整合·····	(334)
第十八章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的整合创新·····	(350)
第十九章	全面整合 普遍创新·····	(367)
主要参考文献	·····	(380)
跋	·····	(383)

导 论

和而不同 整合创新

马克思称有价值的哲学犹如“闪电”、“头脑”。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庙里的神”。音乐大师说：“头脑是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的。”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哲学之为“真正的哲学”，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受何因素制约呢？其客观标志是什么呢？纵观哲学发展的历史，不难窥见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真正推动哲学思维方式前进的，不是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晦涩的思辨，更不是任何“权威”和强权的武断，而是人类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探索着的实践活动及其在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上形成的知识及其体系。因而，研究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逻辑沿革，就不能不研究人类社会的实践和认识发展的历史。

过去的10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级两跳”。我们从一个长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跳跃，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跳跃。人类社会所经历的4种技术社会形态，即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我们在100年中就经历了3种。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又一种世界潮流，力争赶上信息化的大趋势，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强国。

现阶段，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矛盾积淀，社会生活中多元性的矛盾同时并存，特别是社会的文化生活领域，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工商文明的功利主义文化、信息文明的网络文化等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们的行为文化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产生着整合效应。从地域的层面上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相互渗透；从制度文化的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文化与资

本主义文化在相互渗透；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进行着矛盾斗争；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看，多元性的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相互渗透，共同产生其整合效应。这个时代，是一个整合创新的时代。文化需要创新，制度需要创新，观念更需要创新。多元文化的整合是实现创新的基础和途径。

21世纪伊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资本、产品、服务和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把人们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网络化手段，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快捷方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全人类似乎都居住在同一村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仍然是各美其美。因此，当今世界，可以称之为“四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化。

多元理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相互整合，必然使得世界文化的人类性的共性特点愈来愈多，而民族性、地域性的个性特点愈来愈少。世界各族人民在文化心理上必将能够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明天大有希望。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整合创新的文化基元。儒家的和合思维及和而不同的原则，可以“和”一切文化之观念；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伦理原则，可以协调现代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念，可以与资本主义的利益均沾的工商文化相整合。

信息技术的网络手段、数字化的虚拟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整合创新思维的技术理性手段。思维方式、文化理念都可以借助数字化虚拟手段，实现超越现实性的创新，因而李白想像的“白发三千丈”和杜甫诗句中的“晨钟云外湿”等这些超越现实的意境，都可以通过虚拟思维被创新出来。虚拟是人 against 世界、对象、活动、意义的人化形式的构建，它主要借助于符号语言的数字化处理实现。现

代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手段。通过虚拟，为人类创造出现实所无法提供的新的发展空间，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之源。虚拟可以把现实的各种可能性、不可能性和不存在性进行思维构成、规则构成和数字构成的创新。人类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科学创新，都可以借助数字化的人工智能手段的整合和虚拟而实现。

无论是思维的整合，还是文化的创新，以及超越现实的数字化的虚拟，都离不开主体的动机和目的，而任何人在思维中都要受到他的已有的本土文化根基的影响，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相互渗透，全方位地整合创新我们的理念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仍然要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的个性优点，而不能完全消解之。和而不同是原则，整合创新是目的；固守自我是保守，完全趋同是虚无。我们既不可“丢尽自家无觅处，手捧金钵效贫儿”，也不可发思古之幽情，抱残守缺。而应多元整合，全面创新。即唐代美学家司空图所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事实上，人类的制度文化、理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整合中实现创新与发展的。新加坡模式和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模式，都是思维整合创新的典型。

凯绍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一个国际研讨会表演场上的常客，新加坡现任驻联合国大使，可谓是一位有关思维方面的专家，他于199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思维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个报告，极力推崇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后来以《亚洲人是否会思维？》为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马布巴尼坚信，西方在亚洲以及别的他仍然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提倡民主、人权、出版自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尚未得到证明，但他认为很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存在于一个过于放肆的自由媒体和一个日益失效的政府这二者之间”。他告诉我们“政治公开性”不

是观察亚洲时的“关键因素”。马布巴尼把亚洲价值定义成下面这几条：“忠诚家庭制度，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节俭，以保守态度对待社会习俗，尊重权威。”

马布巴尼说：“亚洲的头脑”们要的并不是民主，只是“好政府”。小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政府，仍然以它自己严格管束、充满威慑、非自由的方式，保持着持续繁荣发展的态势。

新加坡的成功，以及李光耀推崇的所谓“亚洲价值”，即对惩罚、尤其是对施之于人身的惩罚的偏爱，也许是李光耀令世界上许多保守派政治家感到亲切的因素之一。小哈瑞·李（Harry Lee）把自己童年受惩罚的深刻记忆，用在国家治理上，通过严管重罚以做效尤措施上。他童年时因为动用了老李先生最喜欢的一罐好吃的，被父亲抓住他的两只耳朵拖曳而走，把他悬在井口上。这一经历从此深刻地留在他的脑海。20世纪70年代，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从《科学的美国人》这类书里，他了解到，“疼痛和震撼在人脑里释放出神经肽酶物质，将新经验的印迹载入脑细胞，使这一经验得以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保留在记忆中”。这也印证了那句“严生威”的古训。

一个“严”字，使我们把李光耀治理的新加坡归类为一种专制的文明天堂。其严厉秩序和辉煌繁荣的结合，使这个国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富裕，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无所不在的麻烦，没有毒品，没有喧哗的示威，没有绯闻，没有依赖社会福利的单身母亲，没有不守规矩的学生，没有族裔冲突，没有多少违法犯罪，而且，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居然没有任何政府以外的反对派。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相整合的典型，李光耀称其为“亚洲价值论”。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得全球性问题也愈来愈多，人们必须站在全方位的立场，以整合创新的全方位思维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全球伦理（或称普世伦理）的建构，在思维方式上，就既不能用

东方文化中心论的标准，也不能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标准，而应多元整合，全面创新。

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该《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由于片面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膨胀，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淡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益加深，使人类社会陷入了相当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

我们可以把在伦理观念中已经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同接受的伦理观念作为“全球伦理”的底线。

“全球伦理”寻觅首先应克服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而应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同时应克服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承认多元文化在伦理上的一致性。

“全球伦理”的建构应从不同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伦理观念中的“最低限度的共识”都是和某个民族的基本伦理观念相联系的。如“尊重他人”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仁学”相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相联系，与印度佛教中的“慈悲”观念也相联系，因此可以把其视作一种“全球伦理”的“最低要求”之一。

但是，“全球伦理最低要求”的建构中，也有与各种文化伦理传统相异的地方。如“尊重他人”与儒家“仁爱”包含的“亲亲”观念、基督教“博爱”中包含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佛教的“慈悲”中包含的“涅槃”观念都有不同的地方。

“全球伦理”包含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方面的内容。

在政治伦理方面，随着大国的霸权地位的江河日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中国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

源，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平等、和平成为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道义标准。

在经济伦理方面，中国的墨家思想或许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兼相爱，交相利”是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出路。

在环境伦理方面，中国传统道家的和谐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和无序的开发造成的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的伦理价值。“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违背了自然就会受到惩罚，庄子的“太和万物”的大和谐思想，主张“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以之自然。”对崇尚自然的价值伦理是十分有益的。

“和而不同”应该是寻求“全球伦理”的整合创新的一条原则。

在哲学思维上，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中国思维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深入人心，都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相互整合的趋势。未来全新的思维方式，必然是整合创新的全球性思维。

第一章 哲学思维方式的沿革 是一个整合创新过程

无论从内在结构上，还是从动态发展过程来看，由于自律性和他律性的条件不同，不同的地域、民族、时代，都有其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从文化发生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一开始就东西有别。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最初是由于欧亚大陆的地理差异而形成的。地表山脉横亘东西而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就分布于南道与北道两大系统，故形成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所谓东洋文明是指中国、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阿富汗、波斯、埃及等的南道文明。西洋文明是指蒙古、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英吉利、法兰西、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澳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北道文明。由于地理之差异，东西文明一开始就在总体的天人关系上存在根本不同。东洋的南道文明由于受到太阳之恩泽丰、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解、人与人和解为特征。而西洋的北道文明，由于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以人与自然奋斗、人与人竞争为特征。^{〔1〕}这种文明的差异自其发生之日起，经过历史的自我演变，一方面各自的特征不断加固，使得二者的区别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二者通过交流、冲突也不断变化、彼此吸收，沿着人类大文化的道路发展。

〔1〕 李大钊：《东西方文明之根本差别》，第 19 页。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该民族精神文化素质和智力的集中体现。历史上健康、活跃、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孕育出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物质文明之果。而某些民族暂时的狂热、消沉、迷惘、创造力的衰退乃至停滞僵化，亦无不与其思维方式的“导航”有关。对于自觉实践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头脑里“怎么想”更重要的了。

100多年来，在中西交流、文化比较与反思的进程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然而，面对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21世纪的中国全面走向世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深层，都强烈地蕴藏着一个传统与革新、中学与西学、体与用、继承与发展的新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振兴，表现为一个精神文化的整合创新过程。

思维方式是不断地发展变革的。如果说每一次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都必然带来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现实的相应变革的话，那么更应该看到社会现实的发展是精神革命的源泉和动力。事实上，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思维方式的沿革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既为我们研究思维方式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又是探讨思维方式变革规律的客观根据。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品质和中国历史的灿烂辉煌，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文明古国。然而，明清以来的闭关自守，使中国被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特别是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我们的祖先仍然陶醉于老祖宗的功劳簿上夜郎自大地自我吹嘘，直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洋人用鸦片和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国门时，我们的祖先方从缠绵的自恋中清醒过来。面对大刀长矛在火枪火炮面前的可怜相，中国人心里的酸痛难以言表。老祖宗发明的圣物——火药，只在观念上被其后辈崇尚，而异邦蛮夷却用它攻击发明者的后代，这岂不令人心酸?! 侵略战争与其说是砸破了中国的国门，不

如说粉碎了中国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保守封闭心态。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心理失落和精神崩溃。尽管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驱使下，中华民族从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的立场上，进行了艰苦的反侵略战争，但是武器装备和物质力量的悬殊，使得这场反侵略战争如同以卵击石。在精神上，由于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静观内省的思维传统与修身养性的伦理观念的劣根性，注定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可怜结局。失败和痛苦迫使中国人从心理深层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并且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寻觅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残暴欺凌的自身根源，从而探索自强之路。自此，掀起了自隋唐以来西学东渐的高潮。

在这一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主流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因而是中国人思维方式革命性变革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物首推林则徐。他虽然从禁烟出发，但是他在不谙西人之情，何谈遏止西人的基本观点支持下，开始去了解西方。但是，了解的结果，使林则徐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发达与中国之落后，从而，为了发展与进步，他从对洋人封港的立场转变为与洋人通商，“所禁惟在鸦片”。并且开展了翻译西方文化的事业。如《华事夷言录要》、《四洲志》、《万国律例》等都是当时所译介的著作。

鸦片战争期间，从文化心理、中西比较方面考察西方者，首推梁廷枏。但是，梁的工作多限于介绍西方，而对西方世界及其影响，真正从文化深层有一定认识的，则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所译书刊，特别是其中的《四洲志》，编纂了一部50卷的《海国图志》。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及西方政教国情的总集。在这一介绍研究的过程中，魏源最早意识到西方的影响力量。他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西而东乎？”他认为，西方世界及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征服，是不可挽回的客观趋势。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以及戊戌变法与传统势力的对抗，使得中国

内部的局势日益紧张，封建宗法观念有增无减。一盘散沙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状态，给洋人再度入侵以可乘之机。事实上，西方势力的联盟使本来就已陷入灾难的中国更加灾难深重。此后，中国人就不能不深思究竟为什么反复挨打？除了物质利益以外，还有没有心理因素、文化传统的问题？对此，乾嘉时代的学者，仍然多从传统的理学角度予以考证阐释，试图以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国粹中挖掘出新的出路。只可惜历史并无恻隐之。英法联军的入侵，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刺激，迫使他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继续坐而论道，而必须在面对现实，注意到国家内在危机与外来祸患的基础上，从心理深层变更自己的思维方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冯桂芬、郭嵩焘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冯认为，中国要自强，在思维方式上，既须反求诸己，亦须取法于人。从经济、军事、人才诸方面，冯都提出了主张自强的见解。这为李鸿章劝说恭亲王倡导洋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鸿章倡洋务，实属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可喜成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概括为由内省向外求，从伦理本位到经济、技术本位的转变。

30年自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再度陷入迷惘和困惑：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在长期了解西洋世界的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制度，因此，自强运动和借鉴西洋文明的基础在于政治制度的改良。为此，梁启超提出了破坏主义的思想，认为只有敢于否定旧的制度，才能变法改良，以造就学习西洋文明的社会氛围。这种破坏主义的大胆主张，是对儒家中庸思维方式的否定。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化上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人们的致思趋向倾斜于政治中心论。

这种致思趋向的政治中心论，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在本质上与维新变法是不同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在思维方式上以破坏主义、政治中心论为特征，

但是，资产阶级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和利用，不再像地主阶级那样狭隘，而是领悟到西洋近代文明的精华。例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其中民主问题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上，这种主张已经远远摆脱了封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本位的旧思维。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第三次高潮。其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所接受，这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五四以后，展开了几次重大的文化论争，其中，中西文化之争、科玄论战等，都表现着思维方式的进步历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向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伦理本位倾向发出进攻。指出伦理本位思维是对自然理性思维的禁锢，由此就产生了中西文化之争。陈独秀、胡适等极力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主张用西方自然理性、向外求知、积极进取、微观实证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向内反求、静观、宏观思辨的思维方式。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国粹派，仍然留恋和推崇传统的儒家学说，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固守传统。后来的科玄论战，就更直接地把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传统思维中的伦理纲常的道德理性的思辨方法对立起来。这一争论的结果，使得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注入了科学理性的基因，文化上科学本位的思想代替了政治本位的思想。

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实质上表现为民主、科学和自然理性思想的渗透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启蒙作用就在于传播西方的这些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再次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高潮。如果把经验广义地理解为文化范畴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又是一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时，觉得我们又落伍了一大截，所以，先是译介西学论著，再从全方位、多角度比较、学习。在这一次交流中，西方思维中的经济思想、功利观念及竞争意识被中国

人所接受并转化为行为方式。但是，面对现代科学带来的社会综合效应，人们在思想深层又想到了人自身，于是，人本主义、价值哲学的主体思维趋向又沸沸扬扬地热了起来。

面对 100 多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历史转化的多层画面及其当代走势，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表现在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上的多难选择，认真研究思维方式的整合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维方式的变革，除了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外，还受到一系列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我们把思维方式变化的外在影响称作他律性，而把内在因素的影响称作自律性。以往我们对思维方式变革的他律性问题研究较多，所谓时代的、经济的、功利的因素的影响作用等，都是对他律性的研究。如果承认思维本身是精神活动的话，那么，就必须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深入思维方式的内部，对其结构、要素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变化的自律性，并且要比较不同质的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从而把握文化冲突中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对于另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反映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从静态解剖和动态演变过程中，解决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振兴与重建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章 论道践仁与求知功利

——思维目标之整合

梁启超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1〕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功夫，就在于论述做人之道。

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传统，主要根源于封建制度的积淀。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绵延中，被继承发展下来的主要是儒、道两家，而且以儒为主。佛家（释家）则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的，它本身也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某种共同的基因。儒、道、释互补、以儒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封建的君主专制，使得人们之间等级不同、尊卑有别。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需要用一套貌似合理的理论去阐释和宣传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科学性”，因而，他们视人伦道德为天下之大道。以纲常关系、君臣关系等伦理问题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文化的主体，哲人们对其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部分人由于不甘接受不平等关系，而在现实中又无从寻觅摆脱这种关系的方法，所以，在精神上就去企求另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这样，道家和释家就帮了他们。大多数中国百姓，在现实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封建的官方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征服，他们不仅成为封建人伦文化的殉葬

〔1〕 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